



政策報告

Policy Paper

《No. 108007》

香港「反送中」運動情勢觀察

Observing on the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Foundation on Asia-Pacific Peace Studies

《No. 108007》

香港「反送中」運動情勢觀察

**Observing on the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主 持 人：張五岳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對臺政策研究小組召集人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撰 稿 人：（按題綱順序排列）

蕭督園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
林穎佑	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連雋偉	中國時報暨旺報執行副總編輯

編 輯：郭姿吟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序

香港政府於今（2019）年2月13日宣布修訂《逃犯條例》，然修法涉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之獨立司法管轄區地位，為反對《逃犯條例》，香港從6月開始爆發大規模社會運動，示威活動從大規模遊行逐漸演變成遍地開花之抗議活動，甚造成警民衝突、社會嚴重對立，影響香港經濟民生。更由於西方國家敦促中共以人道方式處理香港問題，以及各界對於中共在港實施「一國兩制」成效之質疑，致問題更加複雜化。鑑此，本會特以「香港『反送中』運動情勢觀察」為專題，邀請對此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專家共同研討，嗣後撰寫政策報告，供各界人士之參考。

本報告由本會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對臺政策研究小組召集人暨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負責綜整，並邀請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蕭督園、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及中國時報暨旺報執行副總編輯連雋偉，分別就「港府及北京當局對『反送中』運動之因應作為及其變化」、「中共動用武力進駐香港底線分析」、「香港『反送中』運動未來可能發展及「香港情勢與中共未來可能對臺作為」子項議題，舉行座談與報告撰述，冀有助於國人對當前香港情勢有所瞭解。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謹誌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目 錄

提要	VI
壹、前言	1
貳、港府及北京當局對「反送中」運動之因應作為及其變化 觀察	3
參、中共對動用武力進駐香港底線分析	9
肆、香港「反送中」運動未來可能發展	13
伍、香港情勢與中共未來可能對臺作為研判	17
陸、結語	23
【亞太政策報告系列】	27

《香港「反送中」運動情勢觀察》

政策報告

提要

壹、港府及北京當局對「反送中」運動之因應作為及其變化觀察

一、香港社會恐持續陷入高度對抗狀態

- 港民對現狀不滿之累積

「反送中」運動從初期著重於司法問題之調整，演化成香港回歸以來對中共整體反感，目前香港局勢反應中共「一國兩制」實施 20 年來，香港基層對中共之好感漸行漸遠，進而促成當前街頭運動。特別是香港物價上漲及生活艱苦，讓不少香港青年加入「勇武派」行列與港府抗爭。

- 「反送中」運動訴求無法取得回應致香港社會持續抗爭

由於戰略判斷失誤及低估香港問題複雜度，造成中共與港府至今仍無法有效平息此場社會衝突。面對群眾呼籲之五大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回暴動定性」、「撤銷對所有抗爭者的控罪」及「立即實行雙真普選」，雖特首林鄭月娥在壓力下撤回《逃犯條例》立法工作，卻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調查警察濫權之訴求，致香港社會持續抗爭，中共宜理性思考如何讓體制更具彈性及包容性，或為解決問題之策。

二、港府與北京對「反送中」運動採軟硬兩手策略

- 意圖以「文攻、武嚇、經迫」使示威者就範

文攻上，中共透過官媒多次強調香港「反送中」運動係分離主義者、外部勢力干預，企圖藉以轉化管治港府之失責；武嚇上，由中共傳媒及軍方持續放出解放軍演練之消息，以威嚇示威之香港人，同時對中共內部鷹派勢力交代；經濟壓迫上，除對企業施壓，如國泰航空受中共施壓，撤換管理層及多名人員後，其餘會計業、地產業、銀行業等服務業亦被告知若不配合共同打擊港獨與「反送中」示威者，恐無法再與

大陸合作，同時在政策上宣布中共中央支持深圳建立「先行示範區」，顯示渠有意在深港長期政策規劃做出重大調整。

- **希冀以警暴、法壓「止暴制亂」**

在警察暴力使用上，香港警方多次遭投訴濫用私刑、侵權虐待、阻礙傷者送醫等違法亂紀行為，恐成後「反送中」時代最大問題；在法律工作上，中共下達「止暴制亂」指令，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於無計可施下，以行政會議快速通過《反蒙面法》，動用港英時期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又稱《緊急法》）。此法或逾越《香港基本法》中「行政主導制」框架，亦破壞《香港基本法》中「以人為本」、「依法施政」、「自由平等」三項原則，恐將港府及示威群眾之關係更推向「攪炒」局面。

- **推行利多政策，期以拖待變。**

中共對香港在軟的一手上，不外乎係重新吸收分裂之工商界建制派回歸，並分化拉攏中間派人士，藉政商管治聯盟，在8月中以經濟景氣不佳為理由推動各種「紓民困」措施，減免電費、減稅、提高各種津貼，推行利多政策，以拖待變。

貳、中共對動用武力進駐香港底線分析

一、中共以解放軍為威嚇力量

- **港警目前尚可控制香港局勢**

倘中共判斷香港特區政府已喪失治理權力，港警已無力鎮壓，甚至開始抗命，中共恐出動解放軍或武警介入香港，惟必定優先動用香港駐軍而非從深圳進入，然此發生機率十分有限，畢竟目前港警力量尚能控制局勢。

- **中共透過解放軍畫面威攝香港民眾**

解放軍駐港部隊及深圳之解放軍與武警近期透過媒體撥放許多畫面，主要以威懾方式告誡香港民眾，並對「反送中」示威者傳達警告之意。

- **中共積極防範香港「反送中」運動造成中國大陸內部仿效**
中共在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威嚇及鎮壓作為，皆在避免香港示威消息傳至中國大陸內部，慎防中國大陸內部群起仿效，尤其波及深圳。

二、 倘出動軍事部隊介入香港，代表中共已決心處理香港問題

- **駐港解放軍藉近期換防針對群眾運動部署**
駐港解放軍不會與香港民眾有太多接觸，在駐防一段時間後會有部隊換防情況。觀察 2019 年 8 月之換防，雖無大規模增兵狀況，惟調派大量有經驗之軍人駐港，同時在裝備亦增防汽油彈與對付群眾事件之裝備。
- **動用武力將使中共付出高「政治成本」**
中共一旦動用武警或解放軍解決香港問題，必須付出相當高之「政治成本」，甚有可能演變成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且後續引發之國際政治問題，皆值得中共多加思考。

參、 香港「反送中」運動未來可能發展

一、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蔓延

- **香港「反送中」運動策略具靈活彈性**
香港「反送中」運動既非過去香港社會運動「年度循環」模式（如六四紀念會活動）及「個別事件」模式（如反 23 條基本法），亦非國際慣用之「佔領運動」模式（例如雨傘運動），而係採「柔弱如水（be water）」哲學，以「帶狀動員」模式拉長抗爭時間，不長期佔領公共空間，一旦警方動用武力立即撤離；且不再有特定領導核心，抗爭節奏完全由網路平臺決定，呈現多元而「去中心」決策模式，故此場抗爭活動時限長且研判困難。
- **香港區議會選舉活動有助示威者獲情緒宣洩出口**
香港區議會於今(2019)年 11 月 24 日舉行 452 位議員改選，屬地方基層選舉，重要性不高，僅需獲 4,800 張選票即可當選，選舉活動或有助示威者宣洩情緒。

二、香港情勢未達「天安門事件」條件惟收場契機難尋

- 香港情勢未達升級為「天安門 2.0」條件

香港情勢不會升級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之因在於：（1）香港「反送中」與 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不同，沒有持續性公共空間佔領，故軍事力量之鎮壓與驅離並無法達到「止暴制亂」目的；（2）以目前香港警察之武力使用觀察，採取強度更高、更具有殺傷力之鎮壓方式並非難事，不須動用到解放軍；（3）隨著「緊急令機制」之啟動，香港政府有各種法律工具，可進一步限縮公民及政治自由。

- 倘港府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可成運動收場契機

中共及港府仍以香港警察做為政權支柱，在美「中」貿易戰對抗前提下，不至出現明顯鎮壓活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在壓力下撤回《逃犯條例》立法，卻未使抗爭止血，倘能進一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回應抗爭者調查警察濫權之訴求，致抗爭者有所收穫或可成為此次「反送中」運動收場之契機。

肆、中共未來可能對臺作為

一、以經濟及政治手段為主

- 可能取消 ECFA 早收清單關稅減讓

判中共將於明（2020）年 9 月以 ECFA 早收清單 10 年大限已到為由，取消 ECFA 關稅減讓。且中共對握有具備中國大陸經濟轉型所需技術之臺商，將無所不用其極另闢蹊徑吸引渠等到中國大陸投資。

- 反制我公布對「中」採購黑名單

倘我總統大選前行政院公布對「中」採購黑名單，對中共而言等於另類貿易制裁及歧視，且將認定此舉係完全配合美方出氣，其或立即公布對臺採購黑名單反制。

- 以公布「臺獨」分子及綠營在陸經商就學等名單，反制《中共代理人法》

中共認為目前《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中共代理人法）僅為緩推，倘日後真正成為法案，對中共而言等於全面禁止臺

灣統派人士赴中國大陸參與政治類活動，故中共或以公布「臺獨」份子名單反制，或將綠營內部有親屬在中國大陸經商投資、就學就業之名單，透過中共媒體發布。

二、以軍事及外交手段為輔

- **短期額外大規模軍演及壓迫性繞臺可能性低**

中共現階段大規模軍演及壓迫性繞臺，對臺灣選情影響有限，而遠海長訓亦為其軍事訓練所需。飛過海峽中線及進入臺灣防識區，進入我火力有效範圍，對共軍無太多好處。

- **中共取臺灣邦交國以自我戰略需求而非對臺施壓為主要考量**
中共建交思維更多從戰略布局考量，報復臺灣僅為附隨效應。南太平洋及中美洲係臺灣邦交國兩大集中區域，前者可前進第二島鏈，有助固守南海並攻擊關島，後者為美國後院，故近期諾魯、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皆值得密切注意。而梵「中」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後，雙方已相互承認任命之主教，並加強文化等交流，惟雙方亦面臨內部壓力，中共打壓家庭教會，致教宗方濟各備感壓力，香港問題爆發後，中共更擔憂與教廷建交，恐被西方價值影響，故近期臺梵邦交相對趨穩。

壹、前言

如果從今（2019）年 6 月 9 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算起，這場因為反《逃犯條例》的示威抗議（俗稱「反送中」）至今超過 5 個月，遠超過 2014 年香港「占中」79 天「雨傘運動」規模，也可說是史上香港參與人數規模最大，抗爭時間最長，最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的運動。儘管香港政府已在 9 月 4 日正式宣告要撤回「送中」條例，但面對群眾呼籲之五大訴求其中四項，包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回暴動定性」、「撤銷對所有抗爭者的控罪」以及「立即實行雙真普選」，港府並未正面回應，造就香港社會依然持續抗爭。

相較於以往抗議活動，如 2014 年「雨傘運動」，此次「反送中」運動不長期佔領公共空間，而採行「柔若如水」之獨特抗議方式，這種方式也被稱為「流水革命」。亦即一旦警方動用武力，抗議群眾立即撤離。且香港群眾抗爭地點不再侷限於九龍與港島核心地區，而是分散到全港包含元朗、上水、沙田、大埔等新界城鎮。尤其是透過社群媒體串聯在每週末出現之帶狀抗爭，由於示威者採取激烈之抗爭手段，這不僅讓警方疲於奔命被迫採取守勢，亦讓抗議者獲得休養生息機會，這些抗爭方式都與傳統抗爭模式不同。

「反送中」條例何以會引發北京與香港在意識形態上如此對立？曾見證 1984《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回歸之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形容，「我們說，這是香港的『最後一戰』。一旦通過，幾乎是完全大陸化，連香港人過去重視的程序正義都不遵守。」如果說 2014 年的「佔領中環」是為爭取普選，代表香港人對民主之追求；2019 年的「反送中」則是挑戰香港人退無可退之底線：法治與自由。香港民間律師團體法政匯思召集人李安然表示，「『佔中』那一次，我們是想爭取一些東西，所以方法可以有很多種，力量容易分散。但這次，我們是要守住底線，那共同的目標就很明確了。」這底條線，根本來自於對中共司法制度之不信任感。這次《逃犯條例》草案內容，除移交項目爭議，亦因新增特別移交安排，證明書由特首發出，不須經由立法會審覽，沒有監督機制，法院也只能就文件證據進行審理，不能審查是否有犯罪事實，有損香港司法獨立性。且絕大多數香港人都不

相信中國大陸會有公平審判制度。加上，對香港人來說，這並不只是未知的恐懼，而是正經歷之事實。例如，2015 年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因寄送禁書「被失蹤」，遭中共政府拘留；中國大陸富商肖建華亦疑似在香港四季酒店被中共公安帶走，或劉曉波等維權人士之遭遇等，皆讓港人難以相信政府說帖。正因《逃犯條例》踩到這條底線，連通常與北京、港府同一陣線之商界，亦為保全自身利益而反對。

為什麼此次香港社會不分年齡大部分都對《逃犯條例》表示強烈反對，曾任香港政府顧問之香港評論員劉細良認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都曾經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中國』，讓『中國』變得更自由化，更接近香港。」，惟實際情況卻恰好相反。一般認為，近年香港「中聯辦」所在之西環，逐漸取代特區政府位於之中環，成為香港政治權力中心，例如介入香港特首、立法會選舉，「佔中」後加強對媒體、社會團體之控制等，「50 年不變」大限還沒過一半，香港人卻早已察覺到無所不在之改變。曾任港英時期權力最大之香港官員，有「香港鐵娘子」之稱的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就曾比較英國及中共統治之差別，「英國是民主國家，有政黨政治做為折衝底線；中共是一黨專政，沒有底線。在它的管制原則下，控制就是一切，所有控制就是為了支持共產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劉細良亦表示，「中國人最愛問，英國統治的時候，香港人也沒有民主，為什麼現在你們這麼愛搗亂？」，劉細良認為「以前港英政府是透過『看不見的手』間接統治香港，現在中共政府是直接統治，深怕你看不見它的手。」，過去在英國殖民下，香港人沒有民主，卻有自豪的法治、自由，如今這些價值在「一國兩制」下之香港逐步消失。

貳、港府及北京當局對「反送中」運動之因應 作為及其變化觀察

一、前言

香港反《逃犯條例》示威抗議至今超過 4 個月，早已超越任何人可以想像的框架，由於戰略判斷上的失誤以及低估香港問題的複雜度，造成北京與港府至今仍無法有效平息這場社會衝突。面對群眾呼籲的五大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回暴動定性」、「撤銷對所有抗爭者的控罪」及「立即實行雙真普選」，雖特首林鄭月娥在壓力下撤回《逃犯條例》立法工作，卻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察濫權之訴求，香港社會依然持續抗爭。

過去的香港社會運動大致來說有兩個模式，第一是「年度循環」式，例如大家所熟知「六四」與「七一」，在短期內有大型動員，但無法持續；另一個是「個別事件」的，如「反國教」及「反新界東北運動」，視運動的訴求是否達標，時間不一。因而香港一直沒有社會與政治長期性衝突經驗，2014 年的「雨傘運動」在 79 天告終也不脫這樣的思考邏輯。故而過去的經驗促使北京、港府與建制派在「反送中」運動過程中，同樣認為港人會追求「穩定壓倒一切」，在反對者感受到政治與經濟的壓力後即會恢復秩序。但這次無法以經驗法則判斷，沒有人可以清楚地預告何時會落幕。

二、港府與北京對運動的反應與階段

從時間的分段來看，今年 6 月 9 日第一次遊行到 7 月 1 日是第一期，多是和平理性對抗；7 月 1 日到 9 月 4 日宣布撤回條例是第二期，出現大量武力衝突；9 月 4 日至今是第三期，希望軟硬兼施恢復穩定。在且戰且走狀況下，北京與港府使用的方式不外乎是軟硬兩手，硬的一手有文攻、武嚇、經迫、警暴、法壓，軟的一手則是重新吸納政商管治聯盟，發放有利政策，期待以拖待變。

在文攻上，不僅透過官媒多次強調香港的抗議是起源於分離主義者、是外部勢力干預煽動及想顛覆港府，先扣上帽子後，藉以轉化管

治失當的失責。而後「港澳辦」出面支持港府與警隊，表明北京對香港社會的「三個希望」：希望各界人士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暴力；希望堅決守護法治；希望盡快走出政治紛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此外，也再次重申北京的「三條底線」：絕不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中國大陸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此外，中共中央政法委也發表《「禍港四人幫」十四宗罪》文章，點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是「禍港四人幫」，是導致香港社會衝突的禍首，這是標準對內轉移焦點的作法。

在武嚇上，由中共傳媒及軍方不斷放出解放軍演練的消息，來威嚇同情示威的香港人，也對大陸鷹派勢力交代。例如 8 月 16 日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在香港機場遭示威者發現後綑綁圍困，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陸軍的微信公眾號，立即針對事件發表文章評論香港問題，並高調表示從深圳出發抵達香港只需要 10 分鐘，並附上大量軍車停泊在深圳灣體育中心的照片。8 月 29 日《新華社》同樣高調報導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凌晨開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關於「香港駐軍人員實行輪換制度」的規定，組織進駐香港以來第 22 次輪換行動，透過大量軍車輪動，讓港人莫忘香港還有駐軍，不敢造次。

在經濟壓迫上，包括有政策與企業兩種層面。在企業的壓迫上，繼國泰航空受到北京施壓，進而撤換管理層及多名人員後，會計業、地產業及銀行業等服務產業也紛紛受到壓力，瀰漫白色恐怖氛圍。渠等被告知若不配合共同打擊「港獨」與「反送中」示威者，恐無法再與中共進行合作，意圖迫使示威者屈服。在政策上則是宣布中共中央支持深圳建立「先行示範區」，顯示出中共有意在深港長期政策規劃中做出重大調整。由於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於 2017 年 7 月 1 日，也就是香港回歸 20 週年之際簽署，這一日期的選取展現了中共原本對香港在整個大灣區中的地位及重視。在這份規劃中，香港和深圳的分工清晰，香港做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和航空樞紐，不僅可確保大灣區運作，亦可支持香港經濟發展。但從6月發生遊行示威以來的一系列事件證明，中共對香港的期望可能只是中共中央政府單方面美好的願望，尤其機場佔領活動衝擊轉運功能，若要完全依靠香港，恐怕會給大灣區長期計劃帶來變數。雖然深圳當前並不具備香港擁有的獨立關稅區優勢，不具備香港的監管透明度，仍需遵守中共外匯管制政策，要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香港金融地位不大可能，但透過政策宣示，讓香港工商界產生被邊緣化壓力，亦有部分效果。

在警察暴力使用上，在6月12日和平遊行中警察開始使用布袋彈、橡膠子彈驅除民眾，已然引發香港群眾對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質疑。在7月1日遊行，由於有群眾衝進立法會並塗黑區徽，警方開始擴大武力執法範圍，不僅強闖商場驅散示威者，大量的催淚彈使用也成為常態。最受爭議的是7月21日，發生元朗黑幫攻擊事件，警方卻選擇漠視，成為促使香港社會不認同警隊的開始。而8月25日荃葵青遊行，警方動用水砲車與實彈嚇阻示威民眾；繼而8月31日在太子站動員員警進入地鐵車廂對所有示威者無差別攻擊，更引發社會對警方是否有打死人的強烈懷疑。而至今，香港警方早已多次遭投訴濫用私刑、侵權虐待、阻礙傷者送醫等違法亂紀行為，已超越「反送中」議題本身，成為「後反送中」時代最大問題。

在法律工作上，北京強烈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採用嚴刑峻罰。從6月至今的抗爭活動中，港警大約逮捕2,000名抗議群眾，但始終沒有多大的威嚇效果。在8月30日起，展開第二波大搜捕行動，於24小時內逮捕陳浩天、黃之鋒、周庭、許銳宇、孫曉嵐、鄭松泰、區諾軒、譚文豪等8名知名社運人物，以各式違反法律名義起訴，並限縮個人行動自由，希冀殺雞儆猴打擊年輕人上街風氣。進入10月，由於北京下達的指令是「止暴制亂」，但林鄭月娥在無計可施狀態下和行政會議快速通過《反蒙面法》，動用港英時期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又稱《緊急法》）。此法恐不僅有逾越《香港基本法》中「行政主導制」的框架，也破壞《香港基本法》中「以人為本」、「依法

施政」、「自由平等」三項原則；更重要的是將港府與示威群眾的關係更加推向「攪炒」局面。

而北京對香港在軟的一手上，大致不外乎重新吸收分裂的工商界建制派回歸，以及分化拉攏中間派人士。在 7 月 21 日後，北京深知只依賴港府已難以化解問題，開始展開軟的一手進行與香港各界溝通。先是在 8 月 5 日由「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深圳邀集香港人大、政協、政團、商會等 500 多名港區政要菁英會商，進行座談討論，聽取各界建議。而後在北京協調下，由特首林鄭月娥與商界共同出席記者會，表明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將「撐企業、保就業」，故而成功拉攏商界回頭，17 間地產商聯合聲明即為代表。可以理解，在美「中」貿易戰及內部經濟嚴峻之際，北京實無太多心力處理香港問題，急欲清理戰場讓香港恢復穩定，這也攸關未來美「中」貿易戰的成敗，所以得到商界對港府的支持是恢復穩定管制的基礎。

在拉攏中間派的部分，這次並不是太成功，由於傳統泛民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支持者，並不全然支持激進暴力的「勇武派」，但本著「不篤灰、不割席、不分化、不譴責、不捉鬼」的五不原則，雙方攜手讓這次的「反修例」活動持續至今。過去北京善用統戰分化，逐一搗破敵人，但歷經 2014 年「雨傘運動」後，能抓能關能打壓的大致上都已清除，卻也促使運動者都潛入幕後，使用匿名網站系統交換意見及執行抗爭，而這種沒有領導核心的運動模式讓北京難以再次分化圍剿。是故，撤回修例後，依然難以分化「和理非」與「勇武」兩派。

故而北京為拉攏年輕示威者，在 9 月 4 日由新華社發表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反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詳細解釋這次「反修例」背後港人的種種生存困境，包括：經濟結構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導致青年看不見未來；嚴重扭曲的樓市價格，使得佔香港人口多數的中產階層戴着「高收入」的光環，卻與基層一起艱苦度日；社會整體為何在無止盡的政治鬥爭中不斷磋砣。少見的在文章中不用「外國勢力」、「反中亂港」、「四大漢奸」等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角度解讀「反修例」風波，而是直接探討

香港問題的關鍵起因。而後港府也在這次最新的《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告》中，強調有心要解決香港社會的居屋和土地開發議題，除收回部分土地、給予現金生活津貼，也強調願意聆聽意見和改善問題。但由於迴避五大訴求的核心議題，依然遭到社會抨擊，建制派亦認為無益於解決當前問題。

三、結論

從目前的局勢觀察，北京及港府仍然會以香港警察做為政權維持的支柱，在美「中」戰略對抗的環境下，不至於進行明顯的鎮壓活動。縱然傳出未來可能先更換特首，但若北京與香港社會雙方在五大訴求上沒有交集，香港仍將持續陷入社會高度對抗的情境，就看哪一方可以撐得更久。總之，這場運動至此直指的已是制度本身，北京實應理性思考如何讓體制更具彈性與包容性，才是解決問題之上策。

參、中共對動用武力進駐香港底線分析

一、前言

從今年上半年開始，香港就陷入極為複雜的狀況，雖說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處理之下，對於抗議的初衷《逃犯條例》已有相當的讓步。但是從 4 月 26 日開始到 10 月整體香港的情勢並無降溫，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在部分街頭抗議現場有如街頭游擊戰一樣。雖然遊行抗議造成生活相當的不便，廣大的香港群眾卻又能容忍這樣的活動，即便在這幾個月中，香港不論在金融經濟與觀光生意上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但民眾還是持續支持，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在對整體「一國兩制」的不滿上，這些抗議逐漸從初期著重於司法問題的調整，演化成香港回歸以來對中共的整體反感。雖說當年中共承諾「『一國兩制』50 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但在 20 多年過去後，香港居民卻對政策認同出現相當的矛盾，這些都促成當前的街頭運動，在此次的事件中形成一個香港對中國大陸不滿的總爆發。特別是對許多年輕人來說，物價的上漲及生活的艱苦，都讓不少青年加入「勇武派」行列。

二、香港警隊的現況

在探討中共是否會動用武力進駐香港前，必須要先了解香港警隊的狀況，畢竟解放軍或是中共武警介入香港的前題是在警隊無法控制現況之時。

香港警隊的執法實力在亞洲地區可說相當有口碑，當然這與過去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的歷練有關。現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為編制最龐大的香港政府部門及紀律部隊。每 10 萬名香港人中約有 450 名警務人員，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排名第 5，為亞洲第一。須注意的是，香港的紀律部隊不是只有警隊還包括懲教署、海關、還有廉政公署（ICAC）及飛行服務隊等。因此，香港真正可以運用的執法力量不會只有警方，特別是 ICAC 對於金融組織調查有相當大的權力。

優勢的警力人數，讓在第一線現場的警力足以應付狀況，其中也跟香港的警察制度有關，不論是便衣還是普通制服警察，絕大部分都有受過「警察機動部隊（Police Tactical Unit, PTU）」訓練。PTU的基本單位為連，每個總警區都有一個連的編組，每連（約 168 名人員）由一名警司指揮，透過輪調輪訓方式，讓香港警隊在面對大型群眾事件時，可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有經驗的警力，甚至接受準軍事化的訓練，並配備有重裝備（俗稱飛虎隊的香港特警也是 PTU 的一支）。至於「EU 衝鋒隊（Emergency Unit）」則是分區管理，因透過衝鋒車運載，在車上也可以配備重裝備，所以一般在各項突發事件爆發前就可以趕到現場處置，控制事態發展，若情況逐漸升級再會要 PTU 支援。至於「速龍小隊（Special Tactical Contingent, STC）」是一個特遣隊任務編組，從當前 PTU 中選派組成。而香港警方在 1997 香港回歸之後，也開始與中國大陸有相當多的合作與交流，特別是在 2014 之後與中共武警部隊、公安部、廣東省公安廳等部門的互動更是密切，以及在人員交流與受訓上都能以司法互助方式進行。為符合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如何應用紀律部隊便是關鍵。

從現場觀察，香港警隊在 7 月底以前的處理都還有一定的保留，警民之間的衝突都還沒有如之後 8 月的升高。雖然有觀察認為現在街頭的警方很多已經是解放軍或武警，但在考量現場執法的指揮調度上，實際可能性不大。較可能的是中共以觀察員的方式介入，或是應用當地的民間勢力來協助中共進行活動。如在元朗出現的暴力事件，配合該處的地緣關係，其中便有相當多的可議之處，這也與中共過去一貫的作法有關。

警隊行動變化的關鍵應該是與今年 8 月 10 日原警務處副處長劉業成回鍋有關，劉業成日前在 2014 年「雨傘運動」有處理大型示威的豐富經驗。其上任後香港警方在街頭的處理上逐漸升級，除使用催淚彈之外，噴水車的應用在街頭示威戰術上與 7 月前有明顯不同。特別是在 8 月底中共公安部長趙克志南下抵港後，港警的作為逐漸升級，其中也與抗議民眾癱瘓機場有關。一旦癱瘓機場或是重要交通設施對於香港的運作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三、中共駐港部隊與深圳的部隊

中共解放軍駐港部隊是一支陸海空三軍聯合部隊，自 1993 年 4 月組建迄今，在主要架構上始終維持一個陸軍步兵旅（軍改後，於 2017 年底改為「駐港合成旅」），一個海軍艦艇大隊，以及一個空軍航空兵團的型態。並由位於深圳的後勤基地與東莞黃江的訓練基地提供支援，總兵力估計約 7,000 多人，其中地面部隊約 6,000 人。雖然規模上為「正軍級」單位；但司令員與政治委員的地位卻刻意提高，享有「副戰區級」待遇，比集團軍軍長還高，主要原因與香港的對外接觸與作為解放軍形象有關。駐港部隊的基本任務，依序為「主權宣示、維穩治亂、搶險救災、防衛作戰」，但駐港解放軍基本上不會與香港民眾有太多接觸，平時在駐防一段時間後會有部隊換防現象。雖然今年 8 月的換防並無大規模增兵狀況出現，但有媒體人在香港街頭觀察，解放軍人數雖然無明顯增加，但有調派大量有經驗的軍人到香港之情況，同時在裝備上有增加防汽油彈與對付群眾事件之裝備。

若北京出動解放軍介入香港，必定會優先動用香港駐軍，而不是從深圳進入，最大的可能是北京判斷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喪失治理權力，港警已經無力鎮壓，甚至開始抗命。但這樣的狀況發生機率十分有限，畢竟目前港警的力量尚能控制，雖然「勇武派」的應對也逐漸升級，但警方在介入甚至配合不滿抗議民眾作為的團體時，都還能控制目前局勢。雖說如此，駐港部隊以及在深圳的解放軍與武警都在近期配合媒體釋放許多畫面，主要應是透過威懾的方式，警告香港民眾。

駐港部隊在港九新界共有 14 處營地，都是實行封閉式管理，石崗軍營位於新界，在香港回歸前由英軍部隊駐守及管理，軍營內設有跑道供飛機升降，當時稱做「石崗皇家空軍基地(RAF Sek Kong)」。香港回歸中共後，石崗基地交由解放軍駐港部隊管理及使用，是駐港部隊各軍營中規模最大的營地。現時軍營分別派駐解放軍陸軍及空軍部隊，而軍營內配備的直 9WA 型武裝直升機、直 9ZH 指揮偵察型直升機及直 8KH 型搜救運輸直升機是解放軍駐港部隊的主要空中作戰力量。2017 年習近平訪港曾到訪石崗軍營並親自檢閱駐港部隊，海

陸空三軍共 3,100 名官兵參與這次閱兵儀式，並展示各種駐港部隊軍備，當中更包括新型防空飛彈系統。

出動軍事部隊介入香港代表中共已經做好決心要處理香港問題。即便是現在的狀況，都還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北京並無直接的介入，許多在邊界上的作為目的是在威懾以及避免香港的消息傳到中國大陸內部，這可能才是當前中共注意的方向。一旦真的動用武警或是解放軍，所需付出「政治成本」相當高，甚至有可能演變成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之後所引發的國際政治問題，這都是北京會多加思考的部份。

四、小結

當前香港局勢也反應了「一國兩制」實施 20 年來的問題，香港基層並未感受到「一國兩制」所帶來的具體便利，反而是在人民社會的生活觀感上對「中國」好感的漸行漸遠，「反送中」運動只是過去累積的總爆發，某程度上也代表「港澳辦」與「中聯辦」在對港政策上的誤判。未來「一國兩制」是否會有所調整，或是在對港政策上是否有可能參考對臺「一代一線」政策，都是可以觀察的方向。對我而言，習近平在今年 1 月提出的「習五點」、「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都是在香港事件發生之前所提出，經過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衝突，是否會影響當前對臺政策的調整與修正？而與香港有關的不實訊息也常見於國內各大網路平臺與通訊群組之中，隨著我總統大選逐漸接近，中共對我不實訊息的攻勢只會逐漸增加，如何從此次事件中學習應對，都值得後續持續觀察。

肆、香港「反送中」運動未來可能發展

今年 10 月 20 日下午，香港示威者發起一場九龍區大遊行，預計由梳士巴利花園行到高鐵西九龍站。儘管警方已經事先拒絕這一場遊行的申請，而且申請者的上訴也沒有成功，但是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及社民連梁國雄等以個人名義承接遊行。陳皓桓後來估計該場遊行吸引了 35 萬人參與，也引發各地點的警民衝突。如果從 6 月 9 日的百萬人上街遊行算起，這場因為反對《送中條例》所掀起的抗爭運動已經轟轟烈烈持續了 135 天，遠超過 5 年前 79 天的「雨傘運動」之規模。儘管香港政府已經在 9 月 4 日正式宣告要撤回《送中條例》，但仍沒有燒熄這場抗爭風潮。是什麼原因讓香港人堅持不願撤退？為何追求民主自由的渴望能夠激發如此強大的集體意志？

近 10 年來，受到國際關注的大型抗議都是以佔領運動方式進行，示威者長期集結盤據某一個公共空間，要求政府對話或是正視其不滿。從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西班牙、希臘、義大利等南歐國家的佔領運動、佔領華爾街，2014 年的烏克蘭革命與臺灣「太陽花運動」，都是採取相同的行動邏輯。但是佔領運動總是面臨了資源與士氣的消耗之問題，執政者雖然暫時容忍抗議活動，但是私底下卻縱容或煽動親政府人士與黑社會份子的暴力滋擾。一旦對峙進入僵局，佔領運動者往往被迫採取守勢，陷入為了佔領而佔領的困境，如此一來，政府通常可以順勢清場，恢復公共秩序。

5 年前爭取香港特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也是場佔領運動，抗議者長期集結於某一個公共空間，迫使執政者正視其訴求。佔領運動需參與者密集的投入，消耗大量的各種物資，如此才能產生必要的政治壓力。佔領運動也需要某種道德理想性，用各種行動展演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例如參與的學生仍在自修學習，抗議者清理垃圾與從事資源回收，都是為了正當化公民不服從所帶來的秩序擾亂。

但是佔領運動的致命弱點就是無法持久，一旦政府採取以拖待變的因應，抗議者被迫防守既有的佔領區，他們忙於應付黑道與親政府人士的騷擾。一開始同情的民意也有可能逆轉，轉而要求抗議者見好

就收，不再堅持理想。運動陣營容易陷入內部爭執，在升級抗爭與保全實力之間難以取捨。同樣是佔領運動，臺灣的「太陽花運動」利用執政者內部的矛盾，主動撤出立法院，還有能力宣稱「光榮出關」；但是香港的「雨傘運動」則是身心俱疲、氣力耗盡，在充滿內部質疑與猜忌的情況下結束，警察逐一清理三個佔領區，恢復秩序。

「反送中」運動不長期佔領公共空間，而採行「柔若如水（be water）」的哲學，一旦警方動用武力，立即撤離。且抗爭地點不再侷限於九龍與港島的核心地區，而是分散到元朗、上水、沙田、大埔等新界城鎮。每週末出現的帶狀抗爭，讓警方被迫採取守勢，抗議者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雨傘運動」是奉行公民不服從的理念，參與者需要自行承擔面臨的法律責任，當初主張「不流血、不受傷、不被捕」的「勇武派」被視為破壞大局的冒進份子；如今，這樣的主動進擊路線儼然成為主流。如果沒有 6 月 12 日金鐘的「勇武」抗爭，《送中條例》的審查不會暫緩，如果沒有 7 月 1 日衝入立法會與金鐘宣言之宣讀，立法會與特首雙普選的訴求也不會重新浮現。在「雨傘運動」期間，架設在夏慤道上的大臺成為指揮中心，但是其「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軟弱領導風格成為眾人批評的問題。因此，「反送中」運動不再有特定的領導核心，抗爭節奏的進行式完全是由網路平臺決定，呈現一種多元而去中心的決策模式。在「不分化、不篤灰（出賣激進份子）、不割席」的訴求下，即使溫和的反對派人士也無法指責在前線搏命的抗爭者，因為《送中條例》的暫緩正是他們爭取到的成果。

很顯然，香港人記取了「雨傘運動」的教訓，這一次他們不再長期佔領某個公共空間，而是採取更靈活彈性的策略。過去 4 個月來，大型的集會與遊行都是在週末進行，週間則是有各式各樣的小規模行動，例如靜坐、人鍊、集體唱歌等。示威者採取激烈的手段，包括包圍政府官署、架設路障、圍堵機場等，但是一旦警察開始採取鎮壓，他們就立即撤退。這樣持續性的帶狀動員並不常見，晚近較著名的案例包括了 2016 年至 2017 年南韓抗議朴槿惠總統濫權的「燭光示威」，以及 2018 年至 2019 年法國抗議燃料稅的「黃背心運動」。

然而，香港的政治情況畢竟不同於民主的南韓與法國。在民意壓力下，朴槿惠在總統任期結束前被起訴並且收押。法國總統馬克宏很快地取消加徵燃料稅的提議，並且全國各地下鄉傾聽民意。相對於此，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林鄭月娥實際上是聽命於北京領導者。在 70 席的香港立法會裏，也只有 40 席是由人民直選出來的席次，不能充份反應民意。這也說明為何香港政府拖了近 3 個月，才願意將《送中條例》從「暫緩」讓步為「撤回」。

在這 4 個多月期間，香港政府其實採用各種手段，企圖止息民眾的不滿，甚至包括釋出利多，以經濟景氣不佳為理由，在 8 月中推動各種「紓民困」措施，減免電費、減稅、提高各種津貼。但是更多時候，政府則是採取強力壓制的手段，嚇阻人民的參與。從 6 月起，政府就祭出可以監禁 10 年的暴動罪名，大規模整肅被捕的示威者。反對派的政治人物與公民團體的領導者經常成為不明人士施暴的對象，從 7 月 21 日元朗白衣人攻擊事件來看，警察縱容、私下勾結黑幫暴力份子，廣為人知。警方所動用的武力也愈來愈不成比例，連急救少女、外國媒體記者都受到嚴重的肢體傷害，更何況是站在更前線的示威者。也有愈來愈多的人以親身經驗控訴，香港警察用暴力私刑、性暴力對待被捕者。

就實際情況而言，香港已經處於準戒嚴狀態，淪入「警察國家」。大部分的遊行與集會都不被警方允許，即使被批准的公眾活動也有可能被要求提前解散。地狹人稠的香港高度依賴大眾運輸系統，但是每當有遊行集會，港鐵與巴士就停駛，阻撓民眾的參與。10 月之後，港鐵已經多次取消晚上 10 點後的列車，其效果也等同於「宵禁」。在 10 月 4 日，政府更以緊急命令的方式頒布《禁蒙面法》，結果並沒有阻止抗議活動，反而更嚴重地，一旦有這樣的先例，香港政府等於獲得不受限的空白授權，未來甚至有可能阻斷網際網路，延長被捕者的羈押期間。

10 月 16 日，《明報》公布一項民調顯示，77% 民眾反對政府引用《緊急令》、62% 認為《禁蒙面令》無法平息抗爭，53% 認為政府要為暴力衝突負最大責任。香港人很清楚地洞悉問題的關鍵，沒有真

正受民意節制的政府，就會產生濫權與濫暴的警察，也因此，香港人的抗爭怒火並不會輕易止熄。

過去 4 個月以來，香港政府大致上採取威嚇與鎮壓（awe and shock）的回應策略，對於示威者採取高殺傷力的武力壓制，甚至是濫捕無辜人士。從 6 月 12 日的金鐘衝突，香港政府就將抗爭定調為暴動，甚至祭出可以處 10 年以前的暴動罪名。警察武力的使用已經沒有節制，也不符合比例原則。10 月 1 日發生警察實彈射擊，幾乎使得一位中五學生當場命斃。從過去的發展來看，香港情勢已經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發展。

香港區議會於今（2019）年 11 月 24 日舉行 452 位議員改選，屬地方基層選舉，重要性不高，僅需獲 4,800 張選票即可當選，選舉或有助示威者尋獲情緒宣洩出口，競選活動或可致抗爭運動趨緩。

包括臺灣在內的外國觀察者，很多人擔心香港會不會出現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也就是說中共領導者認為情況已經失控，不得不動用軍隊來鎮壓民眾抗議。個人認為，這樣的情節可能性非常低，原因在於：（1）香港「反送中」運動不是佔領運動，與 1989 年的北京民主運動不同，沒有持續性的公共空間佔領，因此軍事力量的鎮壓與驅離並無法達到「止暴制亂」目的；（2）以目前香港警察的武力使用來看，採取強度更高、更具有殺傷力的鎮壓方式，也並非難事，不需要動用到解放軍；（3）隨著《緊急令》機制的啟動，香港政府有各種法律工具，可以進一步限縮公民與政治自由。

伍、香港情勢與中共未來可能對臺作為研判

一、涉臺主導權的變化

隨著香港「反送中」抗爭逐步失控、美「中」貿易戰打打停停下，目前對臺決策已由中共外事委員會辦公室全面主導。倒非國臺辦被邊緣化，而是在美「中」貿易戰起起伏伏，香港「反送中」下，原本臺灣問題擱在後頭，但北京看到香港局勢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衝擊，美國也在暗中推波助瀾，當務之急是在這三問題之間，築起防火牆，這已超出國臺辦的職權。

總統蔡英文上臺之初，中共大幅縮減來臺旅行團，當時沒白紙黑字公告，只有國臺辦在例行記者會上間接證實，「原因眾所周知」，代表還對綠營留有餘地，也展現對臺的細膩。2019年5月15日，中共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還表示，今年「五一假期」赴臺旅遊的陸客人數上升，是因愈來愈多城市支持「九二共識」。

隔2個多月，7月31日，中共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發出關於暫停大陸居民赴臺個人遊試點的公告：「鑑於當前兩岸關係，決定自2019年8月1日起暫停47個城市大陸居民赴臺個人遊試點。特此公告。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接著8月7日，中共國家電影局發布消息，將暫停中國大陸影片及人員參加2019年第56屆臺北金馬影展。這種直接公告並付諸實施，係外交部門典型做法。

中共外事委辦公室主任、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以及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屬外事委與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日前香港局勢嚴峻時，中共於8月中旬突然派出官員訪美，說明如被迫對香港使出最後必要手段前，先給美國「打預防針」，正是派楊潔篪出馬。

二、北京的壓力與臺灣的壓力

2019年是中共建政70年，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2022年是中共要舉行20大，3個數字，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口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密碼，習對解決臺灣問題有強烈使命感。

與此同時，中共反獨逐漸精準化，馬虎不得。從早期「反對臺獨」的籠統說法，轉變成反對任何形式「臺獨」及形形色色「臺獨」，今年6月下旬時，《新華社》記者就毫不客氣在國臺辦記者會場合上，以「修法臺獨」來指稱，蔡政府當時推動的一系列國安修法舉措。剛上路的《108課綱》，也遭《人民日報》批評，此舉企圖切斷兩岸血緣歷史，將中華文化連根拔起，更首次以「教育臺獨」，來批判民進黨一連串隱性「去中國化」手段。

三、《境外勢力透明法》與香港是兩大變數

自北京立場觀之，《境外勢力透明法》（一般稱為中共代理人法）是典型「修法臺獨」，把大陸當成另一個國家，而且充滿敵意，直到踩進中共的紅線。

其次，對於民進黨政府擬將公布對「中國」採購黑名單，後來又推遲，北京也非常在意。

再者，民進黨政府與香港「反送中」的連結。北京已認定這是顏色革命，意圖推翻中共在香港統治。北京關注我政府一言一行，主軸有三：一是否有直接間接資金資助反送中抗爭，如先前網傳透過匯豐銀行資助？二是否以個人身分協助的臺灣學界與基督長老教會等團體，有政府背後操控？三是否給「勇武派」提供來臺灣庇護？

四、「中共代理人法」緩審與不介入香港

今年9月14日之前，民進黨立院黨團放出《中共代理人法》恐來不及審，中共出入境管理部門即於9月16日公告，自9月20日起恢復受理海西20個城市對金門、馬祖、澎湖小三通個人旅遊簽注申請。

9月14日海基會大陸臺商秋節聯誼座談會來了兩位稀客，一是今年5月甫接任中共臺企聯總會長的李政宏，二是中共臺企聯前任會長王屏生。這是繼2016年9月的臺商秋節聯誼座談會後，再有中共臺企聯總會長再度出席海基會舉辦的臺商座談會，判與《中共代理人法》緩審有密切關聯。

北京關注，蔡英文總統多次強調支持香港「反送中」但不介入，沒有與被北京列為頭號「港獨」份子的黃之鋒見面；「929 臺港大遊行：撐港反極權」在臺北舉行，民進黨有參與，但官員未參加，香港歌手何韻詩遭潑漆後舉行的記者會上，民進黨黨職人員也未出席。

五、北京之後可能動作研判

在習五條發布後，中共單方面推進統一進程，「操之在己、寄希望於自己」。套句中共官員的話，「連民進黨是否連任我們都不在乎了，還管國民黨內鬥」。在臺灣問題之前，北京當下有更多難題尚待解決，（1）通貨膨脹、白領裁員問題；（2）與臺灣問題一定程度連動的香港問題；（3）「四中全會」之前，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出手框正周邊大架構，如日「中」關係進入新篇章，習確定明年春天將訪問日本，日本首相安倍亦接受央視訪問，歡迎習近平訪日，中共派出太原艦回訪日本等。習近平與印度首相莫迪，舉行印「中」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

（一）以多元傳播管道進行心理威懾

在 2019 年 8 月，先是非負責防衛香港的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陸軍透過微信發文，指深圳出發到香港只要 10 分鐘，還搭配寫著「港獨分子」、「秋後的螞蚱」的蝗蟲圖片，指「秋天會逐漸絕跡」。但不久後卻又自刪文章。同月，解放軍火箭軍在微博發文稱，「我也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以威懾外部勢力。同時，央視也於 8 月 15 日配合報導指出，火箭軍「天劍」演習已正式啟幕，畫面中火箭軍實射所使用的彈種，赫然是對臺意味強烈的「東風—15」彈道飛彈。

（二）利用大規模軍演及壓迫性繞臺手段可能性低

北京多次多次論證，若蔡英文總統正式訪美並在國會演講將如何因應？有提以演習掩護，直接攻占金馬小島；也有提要有新思維，因 1995 年、1996 年臺海危機是江澤民剛利用楊白冰事

件固軍權，需有個大動作證明其是軍隊統率，如今習對軍隊牢牢掌握，沒必要對民進黨當局配合演出？

至於繞臺，尤以過中線等壓迫性舉動，政治意義仍大於軍事意義。遠洋長訓只要前出島鏈，就是宮古海峽與巴士海峽輪替，這是軍事訓練所需。飛過海峽中線與進入臺灣防空識別區，皆係進入臺灣火力有效範圍，西部又是臺灣防空火力最密之處，加上我空軍相對克制，此作法對共軍並無太多好處。

（三）以自己之戰略步調奪我邦交國

目前臺梵邦交相對趨穩，梵「中」在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後，雙方已經相互承認任命的主教，文化等交流增加，但雙方也面臨來自內部壓力，中共持續打壓家庭教會，讓教宗方濟各備感壓力，香港問題爆發後，中共更擔憂與教廷建交，恐會被西方價值影響。

從蔡政府上臺後之斷交軌跡來看，中共思維已改變，建交更多從戰略布局上考量，報復臺灣只是附隨效應。臺灣邦交國集中於南太平洋與中美洲地區，前者可前進第二島鏈，有助固守南海並攻擊關島，後者是美國後院，故諾魯、瓜地馬拉或宏都拉斯皆值得留意。

（四）或以「對臺採購黑名單」及取消 ECFA 關稅減讓為報復手段

站在中共立場，倘總統大選前夕行政院公布「採購黑名單」，等於另類貿易制裁、貿易歧視，且等於完全配合美方出氣，中共或立即公布「對臺採購黑名單」反制。

目前《中共代理人法》只是緩推，如日後真正成為法案，對中共而言，等於全面禁絕臺灣統派人士到中國大陸參與政治類活動，北京不排除也公布「臺獨」份子名單，或把綠營內部有家人在中國大陸經商投資、就學就業的名單，透過中共媒體發布。

北京下一步瞄準的是對臺 1,300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1) 中共明年會取消 ECFA 關稅減讓，不會顧忌臺灣方面之立場；(2) 據中共多部委研究，目前在中國大陸的臺商分為三部分，一是主力已回臺投資，二是把中國大陸廠房陸續分散至東南亞，三是在中國大陸有龐大客戶，及具備中國經濟轉型所需的技術。前兩個部分，中共沒有興趣，最後一種，受制於中國大陸訂單，仍須維持在大陸生產規模，對於握有中共所需技術的臺灣廠商，北京會無所不用其極進一步吸引到中國大陸投資。

(五) 讓「亡國感」弄假成真

藍綠兩黨正在爭議的「亡國感」話題，民進黨政府的邏輯是如國民黨當選，加上當前香港局勢，臺灣主體意識將不再；國民黨則批評是發國難財，惡意炒作。對中共來說，臺灣「亡國感」的決定權與詮釋權是在北京，怎麼會變成民進黨在操作。中共或用輿論來散播真正的「亡國感」，即再讓民進黨連任，臺灣恐真亡，一旦造成大規模恐懼，對北京有利；或是發動臺商發聲，強調要安居樂業，不要戰爭等。

陸、結語

在以往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的法治被認為是維持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最佳保障。一般認為，由於香港在英國統治時期與 1997 年後之「一國兩制」下，仍維持普通法系統，香港做為特區政府之法制，在本質及理念上與中共中央的中國大陸法律系統不同，因而容易在法律解釋上產生適用之差異，其中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香港基本法》實施後分別做出之 5 次解釋（以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最為明顯。北京每次釋法均被冠上對香港法治、高度自治及司法獨立造成嚴重打擊之批判。特別是 2016 年 11 月就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所做之第 5 次釋法，由於較以往 4 次釋法更加細緻且具體化，被香港法律界人士認為逾越釋法之範圍。

不可諱言，中共為一黨專政且有濃厚人治色彩之大陸法系國家，加上依據《香港基本法》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掌握解釋法律之權力。原本釋法旨在解決「一國兩制」下，做為實施社會主義之中國大陸與實施資本主義之香港，兩者間法制競合之困境，並非針對依據「一國兩制」方針，將原來屬於香港內部高度自治事項，不斷透過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並具體而為做出解釋。雖香港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後，法治尚維持獨立之運作，但中共基於高度政治考量，密集地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不僅影響各界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法治」之看法，亦造成香港政治與社會之對立。事實上，釋法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新法律秩序之產物，雖不應視為對香港法治之破壞，但並非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可隨意對《香港基本法》進行解釋，因過度釋法必然蠶食香港法院之司法權。而這次的反對《逃犯條例》，可說是香港民眾認為捍衛香港法治之最後防線。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香港市民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連續發生幾次龐大的社會動員，分別有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可以說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社會動員事件，亦可說是香港市民再一次清楚表示拒絕與中國大陸全方位融合。突出的是「香港本位」的意識，也再一次向中共政權及全世界重申，在「一個兩制、港人治港」的九

七回歸體制安排下，香港人堅持要維持中港兩地在制度上的區分。此次史上人數最多的抗議，可說是香港公民社會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後的一個主要發展特點。

5年前的「雨傘運動」，是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結合了傳統本土民主力量，為爭取落實《基本法》承諾的政治發展而發生的大型公民社會動員，結果在香港政府的強力壓制及寸步不讓之下無功而還。此一結果一度令香港公民社會走向渙散，整個香港社會瀰漫強烈的無力感，香港特區政府也進一步加強對議會的控制，中共及其官員也愈來愈明目張膽地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插手原本被界定為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中。這種發展趨勢，被視為令香港逐步走向「一國一制」，「50年不變」的承諾也看似愈來愈難以保證。但這種轉變卻沒有令香港社會變得更容易管治，香港特區政府缺乏民意授權、缺乏政治上的認受性、現實的體制操作也被不少人視為缺乏正當性。因此，就算是不明顯涉及政治爭議的政策問題，也經常面對各種制肘，施政效率日益下滑。有一些政策問題長期得不到改善，有一些迫切要推行的政策措施，或起碼應該提上政策議程討論的政策議題，也長期沒有得到正視，造就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展望未來，除非中共改變其20多年來對香港的政策，否則香港今天的政治局面將長期維持在這一種緊張的狀態中，目前觀察似乎難以樂觀看待。事實上，就北京而言，已經將此次的「反送中」運動定性為直接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版顏色革命」。中共港澳辦發言人在9月3日的記者會上明確指出，一些激進分子身上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在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4個字，左邊寫著「反中」，右邊寫著「港獨」。

從中共19屆「四中全會」所公布的公報，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其後中共全國人大常委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又稱，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一系列相關工作任務和要求，當中包括「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11月5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會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首度對香港情勢發表談話，並表示「香港反例風波已持續了5個月，妳帶領特區政府克盡職守，努力穩控局面改善社會氣氛，做了大量艱辛工作，中央對妳是高度信任的，對妳和管制團隊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11月6日主管港務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接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韓正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親自會見林鄭月娥，充分肯定她和特區政府工作，希望林鄭月娥帶領香港管治團隊再出發再前進。韓正又指，充分肯定特區政府的工作及警隊的努力，中共中央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韓正表示，近5個月來修例風波演變成持續不斷的暴力活動，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踐踏法治和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這種極端暴力破壞活動在當今世界任何國家和地方都不能容忍和接受，暴力破壞活動和激進分離勢力行為遠超法律道德底線，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傷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廣大市民切身利益。韓正表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前最重要工作，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共同責任和最大共識，希望社會進一步凝聚反暴力、護法治、保穩定的正能量。

是以，在「反送中」之後，北京政府是否能就此正視香港民心思變，調整管制方式，答案恐怕不甚樂觀。對當前的中共政府而言，維持國家安全和穩定是最重要的執政方針，很難把手從香港抽開。香港中文大學蔡子強教授就表示，「以前中央的態度是，國內不能做的香港來做，現在卻變成，國內不能做的香港也不能做。他（習近平）已經說的很清楚，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制權，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雖然這次「反送中」，讓香港人體會到抗爭成功的可能性，但長遠來看，只要中共不改變對香港管制方式，持續讓「一國兩制」朝「一國一制」發展，一般認為香港的前途、命運，最終還是掌握在北京中央政府手裡。在「中」、港長期存在的矛盾，乃至國際社會高

度關注甚而介入香港事務後，除非北京對港方針與香港政府之治理，在戰略思維與政策上有新作為，否則香港社會恐仍陷於動盪與對立。

【亞太政策報告系列】

No. 108001 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及中共維穩作為

No. 108002 2019 年中共對美戰略及周邊外交布局

No. 108003 美「中」貿易戰背景下中共經濟政策走向

No. 108004 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一周年之觀察

No. 108005 2019 年中共對臺工作重點

No. 108006 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

No. 108007 香港「反送中」運動情勢觀察



和平發展

Peace Development

宏觀視野

Macro-Perspective

政策導向

Policy-Orientation

10087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60巷1號

No. 1, Lane 60, Sec. 3, Tingzhou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87, Taiwan, R.O.C.

TEL : 886-2-2362-6599 FAX : 886-2-2362-8363

WEB : <http://www.faps.org.tw>